

燕园记忆

燕园

哲思录

YANYUAN ZHESILU

胡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燕园记忆

燕园 哲思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燕园哲思录 / 胡军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6

(燕园记忆)

ISBN 978-7-301-16267-5

I. 燕… II. 胡… III. 哲学—研究 IV.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7472 号

书 名: 燕园哲思录

著作责任者: 胡 军 著

策 划 编 辑: 高秀芹

责 任 编 辑: 梁 勇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6267-5/B · 0858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7.25 印张 6 页彩插 223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蔡元培大学理念的哲学意蕴

——代前言

一

《传习录》载，王阳明与其弟子之间曾经有过这样一次对话。阳明问他一个弟子道：“你看这个天地中间甚么是天地的心？”弟子答道：“尝闻人是天地之心。”阳明接着问道：“人又甚么叫作心？”答：“只是一个灵明。”于是，阳明说道：“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阳明此处所说的心或灵明即是指人的道德意识或认识作用。我的灵明究竟是否是天地鬼神的主宰，是一个很复杂的哲学问题，对此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我们不拟在此讨论。但在身与心的关系上阳明坚决主张灵明是身体的主宰。

当然在阳明看来，此处所说的心与灵明之间是有着细微的差别的，但我们大可不必在意这样的差别，只需要指出心或灵明是身的主宰已然足矣。于是阳明说道：“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发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细细阅读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的著作，我们即可知道，“身之主宰便是心”的思想应该是一个普适性的至理名言。如若不信，我们可以自己翻看西方文化关于灵与肉之间的关系的论著便可一目了然。

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灵魂与肉体始终是被分割成为两个互不相关

的部分，是对立的两截，分属于两个根本不同的国度。肉体是短暂的，是会腐朽的；而灵魂则是永恒的。这就是说，灵魂是先于肉体而存在的，而且在肉体腐朽之后也将继续永存。肉身存在于俗界，灵魂的家园则是天国。由于原罪，灵魂不得不受罚而进入俗世的肉身之中，灵与肉因此结合而生活在俗世之中。灵魂与肉身即便结合在一起，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灵魂，是灵魂主宰着沉重的肉身。而肉身所以存活在这个俗世之中的唯一的终极性目的就是赎罪，以期身体死后灵魂可以重回天堂。这就清楚地表明，灵魂是先于并高于肉身的，而肉身在此世的全部存在只是为了听从灵魂的安排，是为灵魂服务的。毋庸置疑，灵魂是身体的主宰。

以上的说法可能宗教味道太浓，不适合某些人的口味，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西方哲学家的相关说法。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关于身心的说法在西方哲学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即便在今天似乎还是哲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笛卡尔哲学的目标是要为知识大厦奠定牢固的基础。所谓牢固的基础是说，这样的基础清楚明白，任何人都无从怀疑起。所以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将那些经不起怀疑的东西都排除掉。如此无情的怀疑将天地万物，甚至笛卡尔本人的四肢、头脑、心血等都在可怀疑之列。于是，唯一剩下的不可怀疑的就是“我思”。所以“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是清楚明白，无从怀疑起的。如果你要怀疑，那么这一怀疑本身就是“思”。“我思故我在”命题中的“我”指的就是精神的或思想的我。然后，笛卡尔从这一命题推演出肉身的存在。我们可以在此清楚明白地看见，笛卡尔哲学思想蕴含的前提也是“身之主宰便是心”。

于是，结论也就是，在灵魂与肉身或心与身的关系上，阳明与西方文化学者、宗教家的看法是互通的。

当然在心与身、灵与肉之间关系问题上，中西文化之间是有差异的，但在主张灵魂高于肉身、心是身的主宰这一点上，则有共同之点。在相对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都怀疑还有什么绝对真理，但在身与心的关系上，阳明的“身之主宰便是心”就是绝对真理。

如果运用上述关于身与心或灵魂与肉身之间关系的理论来审视和关照中国的高等教育的话,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高等教育或大学究竟有无心或魂?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那么高等院校的心或魂是什么呢?

急剧膨胀分化、迅速传播延伸的实用性知识体系与弥漫笼罩于整个社会的极具功利性的技术文化,这两者紧紧纠缠在一起编织成了一张无所不包的世俗之网,将我们的高等教育包围得水泄不通,遮蔽了人的真实存在,使我们看不到存在于世俗之网背后的鲜活的人生,也使我们根本看不到高等教育或大学的真正的使命。或者换句话说,大学的使命被极大地扭曲了。在有些人眼中,大学的使命就在于传播知识、教授技艺以使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中有机会谋求职业维持生存。在这些人看来,大学的魂或心是什么的问题,根本就是一个极其迂阔而不切实际的问题。

没有心或灵魂的个人无疑是个行尸走肉。个人如此,其实社会或团体,即便是极其着重功利性的企业也应如此。没有心或魂,或用现在流行的话语来说,没有基本理念,任何一个团体都不可能获得成功。尤其是作为一个研究纯学理的机构的大学,如果没有自己的核心理念或灵魂的话,也就没有资格承担起引领社会前进的重大责任。所以,在我看来上述问题不是虚无不切实际的,而是中国大学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无疑,我们这里所谓的大学教育当然指的就是人的教育,世界上的所有教育都是人的教育或关于人的教育。受教育者是人,授教育者也是人。即便是那些专门的技术院校也都是关于人的教育,不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均是人,即便学校内传授的关于工程、技术的知识也都是人的知识,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关于自然、社会及人类本性的知识。总之,任何教育都是人的教育,都必须围绕着人而展开。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教育的终极旨趣和崇高目标就在于使人成为真正的人,成为有远大理想、崇高人格、坚定志趣、关心他人、有社会责任感、具有丰富知识的人。因此“我是谁?”、“你是谁?”、“人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或价值等问题应该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急需解决的最为

重要的问题。为研究这些问题而提出的种种理论就自然形成了高等院校的核心理念或魂。

毫无疑问，人文学科中的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等是以人性、生命的意义、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与义务等为对象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文学科就是关于人的学问。

社会科学呢？从表面看，社会科学似乎与人距离较远，而是以关于社会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比如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的学科。其中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配置稀缺资源等当然是经济学研究的关键。又比如什么是政治学。《辞海》是这样定义政治学的：以国家及其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诸如此类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定义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社会科学似乎与人或人类相去甚远。这样的印象显然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国家与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我们简直不能够想象如果没有人的话，何来社会和国家呢？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我们又怎么能够确定社会与国家的性质呢？又怎么来正确地研究社会经济运作的现象及其规律呢？可以说，人的社会性的一面是社会与国家之所以能够形成的真正的原因。

其实社会科学与人的关系只要我们稍加分析便一目了然。真正让我们感觉到困难的是自然科学与人的关系。从自然科学教科书上的那些抽象的形式化的公理推导系统中我们根本看不到人的身影，难道这些学科与人还有什么密切关系吗？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生意义等在这里似乎并不是关注的焦点，所以结论自然也就是，自然科学与技术似乎与人没有什么关系。

不错，从现象看，那些关于自然的科学与技术似乎与关于人的主题相去甚远，但是对自然的科学与技术的分析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关于自然的科学与技术的知识同样是人的知识，是人形成的关于自然、社会及人的知识。

我们一谈到数学知识，首先想到的便是点、线、面及其相互之间的数量关系以及表达这些关系的数学公理、定理。只要我们谈到天文学，我们便不由得想起浩瀚天空上那些关于渺茫的星星、月亮、太阳等似乎与人根本没有关系的现象，如此等等。其实这样来看自然科学知识的性质是错误的。自然科学固然是关于自然的科学，社会科学也毫无疑问是关于社会的科学，这样的看法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可以清楚地表明，如此的想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任何知识显然都是人关于自然、关于社会的知识。如果没有人这样的主体，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因此没有人类富有创造性的理性活动，我们决不可能创造出包括数学知识在内的所有知识系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爱因斯坦才如斯说道：“比如整数系，显然是人类头脑的一种发明，一种自己创造自己的工具，它使某些感觉经验的整理简单化了。”作为先验的数学知识如此，其他任何先验学科的知识也是如此。比如谈到逻辑学，我们首先想起的是那些令人感到乏味枯燥的推导原理或公式。其实逻辑学知识真正目的在于说明人类推理能力的原理和作用，以及人类所具有的那些观念的性质（参见《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总序）。

先验知识如此，那么关于自然的知识又是如何的呢？

不错，关于自然的学科知识显然并不是人类一厢情愿的创造，而是运用人的感觉器官在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之上，运用人类的智慧创造出来的。不错，自然科学知识是关于自然的，但它却起源于人类内在的心灵深处的创造性活动。

总之，一切学科的知识都是人类的知识，不管它们在表面上与人类似乎毫无任何关系，但它们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最终回归到人性中来。所以一切知识都是与人密切相关的，是人创造出来的。没有人类好奇的探索及深入的研究，这个世界上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种类的知识体系。这应该是一个绝对的真理。

如果上述的论点能够站得脚的话，那么进一步的结论也就是，人及

关于人的学科应该是所有学科的唯一牢固的基础，是所有知识体系的核心。从这样的结论出发，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理解所有的学科，懂得一切知识体系的性质。从而也进一步懂得了高校内各院系之间也有着统一的关系。理由就在于，创造知识体系的人决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处在多维的关系之中。在所有的多维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是人内在的精神维度。

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上述结论得出如下这样的看法，即我们对于自然、对于社会的任何知识的进展取决于我们对自己本性的看法。我们的知识能否正确地反映外在的自然界，也完全取决于人类的认知能力。在我们还不能够对人类的认知能力的范围做出正确的判断之前，我们只能说，所有关于外在自然的知识都是不确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是在逐渐地推进和深化。我们对自然的认识结果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认知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人的学科应该是其他一切学科的唯一牢固的基础。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完全取决于人性学科的发展与进步。我们对自己的本性及能力的研究每前进一步，我们对社会、自然的认识就会相应地前进一步。

我们的结论自然也就是，关于人的本性的探讨应该是大学的核心或魂。大学的教学、研究及管理设置要紧紧地围绕上述的核心或魂才能得到理想的发展与长足的进步。世界教育史也清楚地表明，凡是能够自觉地将人性学科视为核心或魂的高等院校便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和繁荣，否则也就只能碌碌无为，徒有大学的虚名。

反观中国的大学似乎走着相反的路径。近百年来，中国的高校走的基本是一条发展技术的路子，重实用、重功利，强调急功近利，为了当下的利益而牺牲长远的发展与繁荣。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中，当然也就没有了高校应有的心或魂。没有核心或魂灵，高等院校就形同一盘散沙，院系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其后果是各个学科走向了封闭的状态，成了一个一个的孤岛。此种状况不只是存在于院系之间，即便同在一个学科之内的各个不同二级学科之间也是相互封闭，缺乏交流，正所谓“鸡犬

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更严重的后果是，富有巨大功利性或实用性的学科在这场争夺战中逐渐地具有了支配性的地位，获得了全胜。而那些不具有或很少具有实用价值的学科也就随之走向了边缘，人文学科于是就遭遇上了这样的边缘化命运。不仅如此，所有具有学理性的理科也同样因此慢慢被人们忽视而逐渐地被边缘化。

如今大学内的这种局面使人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难道这些学问或这些知识体系之间是毫不相关的吗？难道大学就像百货商店或现代超市内各个柜台出售的货物一样毫无关系？抑或大学就像昏暗灯光之下的出售古董的地摊，仅供人们在其中随意选择挑选？

这种局面妨碍着大学的发展与繁荣，使学术停滞不前，学者们不可能创获新的思想，学生也因此学不到新的知识。

不过蔡元培长校期间的北京大学应该是个例外，在蔡元培心目中的北京大学是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核心或灵魂的。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蔡元培到任伊始，在其《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便直截了当地宣告：“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他看来，北京大学的使命就是研究高深而纯粹的学理，除此而外没有其他任何的目的。他本人是始终怀抱着这样的理念。可以说，这句话是理解蔡元培整个大学理念的核心。因此忽视这一理念，就是对蔡元培大学理念的无意的误读或有心的歪曲。

这一理念的核心是，“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句话的真实确切的含义。此句话含义丰富，我们当细细玩味。

我的初步理解是，所谓“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应当有这样的几个含义：

第一，蔡元培的意思是来北大者，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均要以学问为第一要务，学问是为本，知识是主体；北大的人当以为学术而学术，而不能有其他任何之目的（关于此，请参看本书内的《北京大学精神的解读》一文）。他这里所谓的学问当然就是关于人的学问，或者说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学问。

第二，所谓的“高深学问”指的是学，而不是术。蔡元培对此有明确阐述。他在《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一文中明确指出：学与术有别，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学之与术虽密不可分，但终要以学为根本，学要重于术。那么，什么是学呢？他答道：“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求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学如此，那么术有何所指呢？于是，他继续说道：“法、商、医、农、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侔也。”蔡元培主张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所在，要偏重于纯粹学理之文、理之研究。这并不是蔡元培在各学科之间硬做前后轻重的区分，他之有学与术的区分是完全从大学的功能着眼，也是借鉴了国外著名大学的成功理念。蔡元培长校之初，北大有文、理、法、工、商五科。他根据上述的学与术的区分，对北大进行改制。将工学院合并进天津北洋大学。他也曾计划将法学院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无奈由于反对者众而不得不终止。将文、理视为大学的核心或魂是目前世界著名大学的惯例，如哈佛大学等便是如此。但在中国教育史上，只有蔡元培、蒋梦麟等人有这样的眼光。现在的北大，文、理不仅不是核心或魂，反倒不断的边缘化了。社会将文、理边缘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社会毕竟是具功利性者多。不可理解的是，在高校内部，文、理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在不断地边缘化。关心高等教育发展的人对此不能不痛心疾首，百思而不得其解。

第三，蔡元培所谓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具有强烈的反对仅仅为了当下的功利性目的而牺牲将来的超功利的思想，他论证道：人类的通性是牺牲现在而为了将来，牺牲现在的幸福而为了将来的幸福。什么是将来幸福呢？蔡元培认为，将来的幸福不是为了口腹之欲，而是为了专致力于精神的修养、精神的享受（关于此点后文会有论述）。

二

其实，在蔡元培心目中的真正的高深学问指的是纯粹的哲学。

蔡元培的这一重要看法固然有德国大学理念的影响。德国大学理念强调大学的目的在于研究纯粹的学理，而这里所谓的纯粹学理指的即是哲学。当然此处所谓的哲学是就其广义而说的。广义的哲学不是指作为与其他学科并列意义上哲学学科，而是指的爱智，所以只要是探寻真、善、美本质的活动都在哲学范围之内。这种意义上的哲学包含着后来所有一切学科体系。关于哲学的这一层含义请参看本书第一部分关于哲学的论述。

显然，德国大学理念的影响是外在的，蔡元培的这一看法还有自己的更深层的内在理据。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进一步追究蔡元培大学理念的思想依据。

事实上，蔡元培就是从世界观与人生观，或者说是从哲学入手来进行北京大学改革的。

早在1912年冬尚在德国留学其间，蔡元培就写下了题为《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文章。出长北京大学之后，他在北大实行的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就是依据上述文章的基本思想提出的。所以我们要真正明了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一系列措施就必须首先清楚知道他的这篇文章的思想主旨。

蔡元培在文章中说，世界在空间上是无边无际的，我们每一个人只在其占有几尺之地；世界在时间上是没有终始的，每人在其中也不过占有数十年之寿命；世界的变迁无限繁复，而我们也只在其占有极短暂的历史。世界无边无际，而我们人类又是那么的藐小。渺小的人类又不得不生活这样的世界之中。那么，人生会有什么意义呢？蔡元培指出，要确定我们的人生观，我们就必须先有自己的世界观。当其时，蔡元培深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认为我们的意识是由物质与形式这

两个原素组成的。而物质与形式又是相互对待的，物质决定不了意识，同样意识也决定不了物质。于是，在物质与形式之上还必须另有自在者。蔡元培指出这样的自在者就是叔本华所说的“意志”。“于是吾人得以意志为世界各分子之通性，而即以是为世界本性。”他认为，作为世界本体的意志是没有目的的，或者说，本体世界为“黑暗之意志”、“盲瞽之意志”。但处在现象世界的人类是有其意志的。

正是在这个大意志的推动之下，宇宙及其中的万事万物也处在不断的进化途中。于是他从无机物讲到植物、动物，最后讲到人类。蔡元培说：“及进而为人类，则有家庭而宗族、而社会、而国家、而国际。其相互关系之形式，既日趋于博大，而成绩所留，随举一端，皆由自阂而通、自别而同之趋势。例如昔之工艺，自造之自用之耳。今则一人之所享受，不知经若干人之手而后成。一人之所操作，布置供若干人之利用。昔之知识，取材于乡土志耳。今则自然界之记录，无远弗届。远之星体之运行，小之原子之变化，皆为科学所管辖。由考古学、人类学之互证，而知开明人之祖先，与未开化人无异。由进化学之研究，而知人类之先祖与动物无异。是以语言、风俗、宗教、美术之属，亦渐为学者所注意。昔之同情，及最近者而止耳。是以同一人类，或状貌稍异，即痛痒不复相关，而甚至于相食。其次则死之，奴之。今则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观念，为人类所公认。而肉食之戒，虐待动物之禁，以渐流布。所谓仁民而爱物者，已成为常识焉。夫已往之世界，经其各分子之经营而进步者，其成绩故已如此，过此以往，不亦可比例而知之欤。”^①我们不难看出，上述的引语表达出蔡元培的两个基本思想：第一肯定了人类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是一种进步；第二，尤为重要的是，蔡元培通过对进化史的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即整个世界是以

^① 蔡元培：《世界观与人生观》，《蔡元培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二卷，第216—217页。

“合”为最终或最后之“鹄的”。除上面所讲的人类社会因交通的便利已逐渐趋同而外，无机物、植物与动物也是以“合”为“鹄的”。如“无机物之各质点，自自然引力外，殆无特别相互之关系。进而为有机之植物，则能以质点集合之机关，共同操作，以行其延年传种之作用。进而为动物，则又与同种类间为亲子朋友之关系，而其分职同功之例，视植物为繁。”^①

考察进化史得出的结论引导蔡元培看清楚了世界的“最后之大鹄的”是“合世界之各分子，息息相关，无复有彼此之差别，达于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相交之一点是也”。^②

世界的通性已如上述，那么人类的通性又是什么呢？为了说明人类的通性，蔡元培首先批判了老子的思想。老子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众所周知，这正是老子关于理想社会的描述。但是蔡元培却指出，老子所谓的理想社会仅仅着眼于当下的幸福，没有看出人类的真正的通性。那么人类所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呢？蔡元培于是接着说道：“自进化史考之，则人类精神之趋势，乃适与相反。人满之患，虽自昔借为口实，而自昔探险新地者，率生于好奇心，而非为饥饿所迫。南北极苦寒之所，未必于吾侪生活有直接利用之资料，而冒险探极者踵相接。有椎轮而大辂，由浮槎而方舟，足以济不通也，乃必进而为汽车、汽船及自动车之属。今则飞艇、飞机，更为竞争之的。其构造之初，必有若干之试验者供其牺牲，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及利用而生悔。文学家、美术家最高尚之著作，被崇拜者或在死后，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得信用而辍业。用以知：为将来牺牲现在者，又人类之通性也。”^③

① 蔡元培：《世界观与人生观》，《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216页。

② 同上。

③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217页。

人类的通性是否就是为将来而牺牲现在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然蔡元培本人是确信这一点的。而他之确信此点则完全是由于在他的哲学世界中本体的意志要高于现象的意志，而现象的意志必然要回归于本体的意志，而成就一个“本体世界之大我”的哲学思想。从这样的世界观进一步推导，蔡元培也就自然而然得出如下的人生观了，“循是以往，必有菽粟如水火之一日，使人类不复为口腹所累，而得专致力于精神之修养。今虽尚非其时，而纯理之科学，高尚之美术，笃嗜者故已有甚于饥渴，是即他日普及之征兆也。科学者，所以祛现象世界之障碍，而引致于光明。美术者，所以写本体世界之现象，而提醒其觉性。人类精神之趋向，既毗于是，则其所到达之点，盖可知矣。”“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固已彰明较著也。”^①这就是蔡元培的新人生论及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论。

细查蔡元培的学术思想经历及其关于哲学的著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的哲学思想是以人生论为其核心的。他曾写有《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哲学大纲》、《简易哲学》等，并翻译过德国哲学家鲍尔生的《伦理学体系》一书。正是由于这样的哲学思想背景，所以在他出长北京大学之初就力邀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他之力邀陈独秀加盟北京大学就是因为陈独秀当时也是以积极宣传一种新人生论而为当时的社会所普遍地关注。

众所周知，早在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就独自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初名《青年杂志》），积极宣传一种新人生论，以辅导青年之修养。其发刊词《敬告青年》（1915年9月15日）系统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而非保守的、进取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人生论。历史地说，这篇发刊词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但是颇具规模的新文化运动则开始于北京大

^① 蔡元培：《世界观与人生观》，《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218页。

学，时间当在1917年初，其实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与北京大学的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学者群结合在一起。新文化运动发源于北京大学，其影响迅速普及到了全中国。

实际上，蔡元培的人生论是与陈独秀等人极力提倡的新人生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之力邀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表明了他的基本理念，就是要以这种新人生论来影响北京大学。发动于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进程。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亲眼目睹了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势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他曾对胡适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岂但并世大学找不出第二个，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找不出第二个。蔡元培领导北京大学影响了一个时代，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蔡元培奠定了北京大学的精神，使北京大学走上学术繁荣发展的道路。其时中国备受列国欺凌，国内军阀混战，政治极其黑暗。蔡元培所领导的新北京大学的出现，“好像一座灯塔，使全国人民看见了光明，认识了前途，获得了希望。全国风起云涌，互相呼应，这就是震撼全社会，移风易俗的新文化运动。”（冯友兰语）

当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此后中国现代历史中所发生的种种社会、文化运动均与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既然新文化运动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那么我们就要深入地了解和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宗旨。

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什么呢？

稍有中国现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新文化运动有两面大旗，一面是思想革命的大旗，另一面则是文学革命。文学革命有两个方面，一是形式方面，另一则是内容方面。形式方面主要是白话文的提倡，胡适的不

遗余力的提倡，使得白话文运动势如破竹，迅速影响全国。白话文运动具有工具性。从内容方面说，文学革命主要表达的是作为思想革命内容的一种新人生论。而此种新人生论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的宗旨。我们一般都将新文化运动定义为民主与科学两项，所以民主与科学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提倡的内容。其实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决不仅此两项，而是提出了将民主与科学包含在内的一种新的人生论。除民主与科学外，此种人生论还强调个人自决、自主、独立的人格；主张平等、自由、博爱；积极倡导人民主权论，坚决反对专制政权，指出国家是人民的公产，而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的私产，提出要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新人生论显然是一种关于人的价值观的理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从此种价值观立论来解读民主与科学的。他们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良好的社会政治制度，更主要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标准。而所谓的科学也不仅仅是指由学理组成的知识体系或学问，而主要是指求实的而不是玄虚的思想方法或态度。

就其实质而言，上述的新人生论就是一种新的哲学思想。或者说哲学主要就是关于人生观或世界观的学问。所以将新文化运动的新人生论概括为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并不为过。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应该就是北京大学的魂。

三

如果一定要细究蔡元培关于所谓“高深学问”的含义的话，我们必须看清学与术之间的区分。为了详尽地了解蔡元培这一精辟见解，我们必须回溯至1901年10月—12月之间蔡元培所写的《哲学总论》一文。总论者只是对哲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功能的概括性论述。

蔡元培在文章的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出：“哲学者，普通义解谓之原理之学，所以究明事物之原理原则者也。”在他看来，哲学是研究万事万